

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美国]杜维明

(哈佛大学 哈佛燕京学社, 美国 马萨诸塞州剑桥)

[摘要] 在西方文化特别是启蒙价值的冲击下,儒家的核心价值——仁、义、礼、智、信这些儒家传统已经基本上被解构了。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五四”时代的文化精英对儒学的批判仍显肤浅和不足,启蒙仍未深入;另一方面,儒学必须对西方的强势有所回应,儒学的发展尽管障碍重重但它仍有转化重生的机缘。

[关键词] 核心价值; 儒家传统; 文明冲击; 新儒学

[中图分类号] B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4)02-0005-08

儒家的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仁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可以作为全球伦理的基本原则。这并不是我自己一个人提出的,而是在人类文明对话年(2001年),由科菲·安南所主持的一个世界知名人士小组中,瑞士的神学家孔汉思先生主动提出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先简要地回顾一下这些核心价值。

一、儒家的核心价值——仁、义、礼、智、信

所谓儒家的核心价值,是指孟子的四端——仁、义、礼、智,以及汉代发展出的五常——仁、义、礼、智、信。

仁是一种差等的爱,此说法曾经引起了诸多批评。批评者认为墨子的“兼爱”或者基督教的“博爱”要比儒家的“差等的爱”更符合平等的原则。所谓差等的爱,从孔子、孟子开始就是针对一种普遍的、没有分疏的爱而作出的回应。儒家的一个基本预设是把社会理解为一个同心圆,从个人到家庭、家族、社会、国家、人类社群一直到生命共同体。这样,仁就需要推己及人,从内向外,从私到公。这个观念有其现实性。墨子的“兼爱”要求我们对任何人甚至陌生人的爱与对自己父母的爱是相同的。当然这是非常高的理想,这理想不仅在基督教,而且在其他理想主义中都突显了。如法国大革命的三个基本价值也是以博爱为基础。可是在实践过程中,如果不是主动自觉的,而是强迫对陌生人的爱如同对自己父母乃至兄弟姐妹孩子的爱是一样的,其结果就是对自己亲人就如同对路人一样的疏远。因此,差等的爱也是一个普遍原则,通过实践过程而逐渐向外展现的。

平常大家理解的义和利是相对的。孟子就有人禽之辨,王霸之辨,义利之辨等。义对利确实是有所冲突。因此站在现代经济伦理的角度上,有些人批评它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实际上,义和利

[收稿日期] 2003-12-20

[作者简介] 杜维明(1940-),男,广东南海人,美国哈佛大学讲座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和联合国“推动文明对话杰出人士小组”成员,浙江大学光彪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儒家及其现代化研究。

的关系可以表述为:义可以包括利,但是利不可以包括义。义是所谓大利,是长远的、全面的利;而不是狭隘的、短期的利。很明显,儒家所讲的大同,就是不同,就是在差异中寻找大同,也是“和”而不同之意。“和”需要通过各种不同的情况综合起来。因此大同是和,而不是同。

礼的观念特别在现代受到了很大的批判,比如说在五四时,礼被认为是吃人的礼教。现代社会特别注重社会资本和文化能力,不仅是经济资本和科技能力。任何一个社会,如果用法来治理,可以得到社会的安定,但不能成为一个动力比较高、人与人之间交往比较厚的社会。那么礼作为社会中非正式的人际关系必须依据的、有时却不能量化的一种行为规则,就可以成为建构在法律的基础上向上提升的一种社会资本和文化能力。

智,类似西方所理解的 wisdom。如果面对我们现在所碰到的困境、情况,有必要分清素材(data)、信息(information)、知识(knowledge)、智慧(wisdom)四者之区别与联系。从上往下看,智慧可以包括知识、信息、素材;知识则可以包括信息和素材。而信息的扩展,知识的扩大,是否能够达到智慧正是大家所要关心的问题。智慧的获得除了要通过听的艺术,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同时要对历史上积累的智慧,即所谓智慧的泉源进行开发,而这些都不能够量化。智慧的获得和人的成长、知识的转化关系密切。因此,在今天,科学技术总是与日俱新,而历史、哲学、文学仍要回到源头寻求智慧。比如柏拉图虽然是奴隶社会的思想家,大家却认为他有很多很深刻的智慧,就是最杰出的研究生要重新了解柏拉图,智慧最终要经过非常复杂的研究。所以怀特海说,整个西方哲学就是柏拉图的注脚。我们也可以试着说,整个的儒家传统就是孔子的注脚。回到《论语》、《中庸》、《孟子》、《大学》这些智慧的泉源,它们不会因为时间推移而逐渐的消失,并失去重要性。因此有必要对文本、对智慧的泉源,作一些理解和认识。

信,在此我们不作深入的讨论。需要指出的是,在商业伦理方面,如果没有诚信,没有透明度,没有公信力,没有真正的让人相信的一些基本原则,那么商业行为、竞争力非常强的市场经济也没有办法进行。

二、从时间、地域、层次解说儒家传统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首先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儒家传统。在此,我想从时间、地域、层次这三个范畴来说它。

第一,从时间的跨度来讲,儒家传统是一个思想的长河。其预设是:任何精神传统,如果不发展、不扩大,就会死亡。它绝对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而一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只是这个动态的过程受到冲击以后,它可能变成潜流;有的时候在思想界被边缘化,但它总是在发展的过程中;甚至有的时候断绝了,但它的影响力在社会各个不同的层级是一定存在的。儒学有先秦的儒学、宋明清儒学、鸦片战争以后受到西方冲击的儒学。据此我将其分为三期。第一期是先秦的儒学,曲阜的地方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中原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慢慢的到汉代成为显学。但这个传统受到佛教和道家的影响,慢慢的成为潜流。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基本上都是佛教、道家的世界。一直要到唐末宋初,儒学从中国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个侧面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也就是这个传统慢慢的扩展到越南、韩国、日本,乃至海外的华人世界。这是第二期的发展。所谓第三期,是在鸦片战争前后,儒学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从显学逐渐被边缘化,逐渐被彻底解构、生命力完全被扼杀的时期。

加州大学的列文森教授就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指出,五四以后,儒家受到中国的知识精英全面的、深入的冲击,从而不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所以,他认为在五四以后,儒家基本上不仅在中国、东亚乃至人类社群都消散了,以后也许会受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思想影响而形成后儒家,但那是另外一回事,至少儒家的思想不能传承下来。我在美国的多年来的工作就是想证明列文

森所阐述的观点是错误的。现在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他的观点即使不能算错误,也算一偏之见。他认为儒家传统已基本被中国所扬弃了,当然并不是以隔岸观火的态度来看的,而是源于一种深刻的悲剧感。因为他认为如果儒家传统受到现代化和西方文化的冲击逐渐被边缘化、被解构,那么世界上所有的精神文明包括基督教的传统、佛教传统、伊斯兰教传统乃至他自己所坚信不疑的犹太教传统将来也会被解构。这个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非常流行。因为现代化作为一个同质化、理性化的过程,根据所谓人类文明发展的铁律,人类的文明是从迷信的宗教,经过形而上学的哲学进入科学理性。很多国内的学者至今仍是坚信整个文明到了科学理性时代,所有的宗教都是迷信,那么儒家作为一种精神文明基本上也被边缘化了。

儒学能否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是所谓的儒学第三期的问题。我相当谨慎地处理儒学第三期发展前景的问题,并认为这并不是靠个人的主观意愿就可以促成的。补充一点,我主张将儒学分为三期,李泽厚先生却主张分为四期,主要是先秦、两汉、宋明、当代。当然按这种分法,我们可以分成十期:先秦、汉代、魏晋南北朝(虽然儒学在思想精英界影响不大,但在政治文化、社会、心灵积习上的影响仍然存在,如一般老百姓受到家训、家规的影响)、宋代、辽金元、明代、清代、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近代儒学、五四运动到1949年的现代儒学、1949年以后的当代儒学。

第二,从地域上讲,即使受到佛教、道家的冲击,儒家的传统仍是中国文化认同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是不能说中国文化在两千年来的发展是以儒学独尊,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因为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末宋初,是佛教的兴盛时期。佛教在中国有八百年的发展,华严、天台、禅宗、净土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传统的发展基本上掩盖了儒学。

事实上,在当时对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并不是孔子、朱熹,而是玄奘。玄奘从印度回来之后,有3000人在其研究计划之中。因而没有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可以与其相比。如果要真正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像玄奘这样的知识分子必须了解。所以说儒家只是中国文化中间的一支,有时是旁支,有时是主流。中国文化包含了佛教、道家、各种民间宗教、元代以后的伊斯兰教、明代以后的基督教(即早期的天主教)等等。虽然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不能涵盖儒家。因为儒家也有日本儒家、越南儒家、韩国儒家之分,除非我们说越南、日本、韩国文化都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也许我们愿意这样说,但越南、日本、韩国的学者不认同。有位学者虽然很讨厌儒家传统,但是认为现在儒家至少能够帮助我们提升民族的凝聚力,乃至发展爱国精神。可是越南的第一流的儒家都是对外来的沙文主义,包括中国、法国、美国的沙文主义持抗拒的态度。所以越南的儒学可以发展越南的凝聚力和爱国精神,而不是我们的爱国精神。

第三,儒家传统是分层次的。首先,民间传统实际上是儒家、佛教和道家合在一起的。如《菜根谭》就有儒家、道家、佛教的思想;一贯道的思想外面是儒家、中间是道家、最深层是密教。然而儒家的价值在民间始终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它在民间的传播不是通过语言文字,而是通过口传。其次,除了民间的儒家传统之外,还有知识分子的儒家传统,即所谓士君子的传统。但这只是儒家传统的一个侧面。以后再探讨这个侧面。再次,还有政治上的儒家传统。比如,大家认为在唐代儒家的传统已经被佛教的传统所取代,可是仔细研读《贞观政要》却发现该书基本上是儒家的精神;此外,《五经正义》亦是作于唐代;连唐玄宗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孝。当然,我们也不能单纯地认为儒教中国是不好的,道统、心性之学是好的;从而认为要发展心性之学就要对政治化的儒家进行批判。需要注意的是,政治化儒家在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复次,在经济方面,儒家一般被认为是提倡重农轻商,事实上这不符合儒家的基本精神。法家特别突出耕战,认为农人和军人在社会上是最重要的,而商人和士人不重要,所以才会重农抑商。儒家是重农而不轻商,因为孟子特别突出分工观念(分工不是一个简单的观念,它的提出是人类发展史的一个飞跃。涂尔干在其重要著作《分工》一书中认为只有通过分工,才会导致有机的而非机械的团队的出现)。他认为,一个复杂的社会除了农人以外,要

有工人、商人。农人解决吃饭问题,工人是解决制造问题,而商人则是通有无,这些是任何一个复杂社会不可或缺的职业。惟一的需要解释的是,既不生产、又不制作、也不通有无的知识分子有什么价值。孟子的观点是,士君子值得尊重是因为他们是意义的创造者,使社会得以维持它的凝聚力、特别是有机的凝聚力所必需的。他们不是政治的依附集团,可以把一般广大人民的声音带到上层;他们有独立的人格,通过他们群体自觉的努力,把社会带入正常的发展。最后,儒学内部亦是相当复杂。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组织的关于当代儒学讨论会,探讨了当代儒学应该如何理解的问题。应邀的有中国、韩国、日本以及欧美的学者,他们是哲学、宗教、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和心理学各个学科的代表。很有趣的是,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地域,对儒家有不同的了解。

哲学和宗教对儒家的心性之学,对儒家的基本理念特别感兴趣。历史学家将儒家当作一个发展的过程。经学家、历史学家朱维铮先生就说,有多少学者就有多少孔子,每个不同的学者对孔子、对朱熹的诠释都不同。政治学家突出儒学的政治行为,认为儒学是专制的、权威的。社会学家对儒学,特别在民间社会、家族制度这些地方比较敏感。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等的看法都有所不同。这样说来,儒家是一个非常繁复的、博杂的传统。即使在塑造儒家传统的最杰出的思想家中间内部的矛盾冲突也非常大,如:孟子和荀子、朱熹和王阳明、韩国李退溪代表的理学和李栗谷代表的气学。

冯友兰先生是把宋明儒学分为理学和心学的最重要的学者。我曾经和冯先生讨论,他说其实还应当有气学,可就没有这种说法;我则回答说,在中国儒学是没有,但是韩国儒学中却有。实际上这是正常的。任何一个涵盖性很大的文明的情况都是复杂的。如基督教有天主教和新教,而新教中至少有几百种流派。伊斯兰教亦是很复杂的。佛教至少有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之分。大乘佛教影响到中国、日本、韩国,另外一个传统是小乘佛教,但是真正的在泰国、柬埔寨、越南所发展的佛学,他们不称之为小乘佛教,而称之为长老的传统。

三、儒家传统的解构

不管儒家的传统怎样的繁复、多侧面、多层次,但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基本上全部被解体。连中国最杰出的一批知识分子都认为它没有生命力了:直到今天,我想在东亚反对儒学的人,比赞成儒学的人要多得多。

20世纪80年代,夏威夷文化研究中心的“现代社会的儒家价值”调查显示:汉城、香港、台北、日本、上海青浦这五个地方中,汉城的儒教价值是最完全的,接着是日本、香港、台北、青浦。

但韩国最近的一种提法是孔子必死,国家乃盛;反之亦有孔子必存,国家乃盛的说法。这些讨论显示,儒家在经过西方的冲击以后,它的解体过程是不同的。也许韩国仍是受到儒家传统影响最大的地方。知识分子抛弃儒学是最全面的,但是并不表示在民间社会,在其他的团体,包括商人的团体对儒家的传统也基本上抛弃了。这种冲击程度在地域上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一般说来儒学基本上可以说是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特别是西方启蒙的冲击而被解构了。

所谓启蒙,一是指在西方17、18世纪所开始的文化运动。也可以说启蒙是一个理念,这个理念还在发展。正如哈贝马斯就认为,启蒙的理念和启蒙的大计划还应该再进行,他所提出的沟通理性就是使得启蒙能够进一步发展的努力的重要方向。另外启蒙也是一种心态,我特别重视这一点。启蒙是一个理性的运动,特别是康德的“敢想”(dare to think)。一般说来,启蒙时代是理性的时代,也就是宗教、形而上的哲学逐渐被边缘化的时代。这一直影响到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受启蒙的影响比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要多。启蒙所代表的价值比传统的价值,包括儒家、道家、佛教都要更有影响力。这一点很容易了解,如我们现在所用的名词包括哲学、文学、经济、政治等都是外来语,而

现在所有的大学、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是从启蒙发展下来的。

可是启蒙又是一个人中心主义,对生态环保有它的缺失,同时它有着强烈的工具理性而不是目的理性。一直到今天,我们所谓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都是受启蒙的心态逐渐影响而形成的。最重要的启蒙,就是突出人的尊严、人的解放、人的自觉、人的独立性。因此有学者认为,个人主义是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即使在法国大革命时代,虽然个人主义是被批判的对象,大家不认为它是有价值的;但是逐渐地经过西化、现代化和全球化,随着个人的选择越来越多,那么个人的独立尊严就越受重视。而其背后当然隐藏一些更深刻的价值,比如说自由、理性、法治、权利等等。

这些通过启蒙发展出来的价值,也都成为普世价值,成为我们的价值。这些价值,真正说来比仁义礼智信在我们的心理结构中更有说服力和影响力。我们要通过很大努力将仁义礼智信加以诠释。但是批评仁义礼智信观点的人很多,我想很少有中国的杰出的知识分子会对自由、法治、理性、权利、个人的尊严进行批判。在中国影响最大的理念是富强。所谓富强就是船坚炮利,主要指经济的权力和军事的力量。这背后有浮士德精神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它强烈的竞争机制能将所有不接受它的理念、制度、游戏规则给彻底冲垮。到现代,不管是殖民主义还是霸权主义,西方文明真正能够对中国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伊斯兰文明、非洲文明和拉美文明进行那么大的宰制。在此意义上,西方的传统基本上把儒家的传统解构了。如果儒家传统不经过重组,不经过内在的批判,不能对西方的价值有建设性的回应,那么在知识界、文化界和学术界就会销声匿迹。

严复开始翻译了很多西方重要的典籍。当时在五四初期特别突出自由和人权这两个西方思想的核心价值,所以严复才说,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但是没过多久就用科学和民主取代了自由和人权。这种转变有一个重要的预设,就是大家主要关切的是救亡图存。李泽厚先生曾经说,这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这启蒙也不是西方的启蒙,是中国的学术界包括知识界和文化界向西方学习,把西方启蒙的精神带到中国,正因为救亡的意愿太强,所以启蒙的工作做的不够,到如今我们仍旧没有能够将其完成。我基本上接受这种观点,但是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得出一个不可质疑的结论,就是要想使中国能够站起来,能够使中国救亡的惟一道路是启蒙,不能说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而是启蒙是惟一能使中国站起来的道路。从整个西方的传统看来,儒家传统都是糟粕,或者大量的都是糟粕。在五四的知识分子当中,很少人想要在儒家传统中发掘精神资源和价值。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当时的那批知识精英都是深受儒家传统影响的。他们深受其苦,意欲除去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如巴金讲家的问题,鲁迅谈到国民性的问题,以及后来柏杨提到的酱缸文化等等。胡适之开始主张全盘西化,后来提出充分现代化的观点。但是他讲全盘西化的原因是当时知识精英的惰性太大,正因为如此,所以要矫枉过正。有趣的是,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虽然主动自觉的要西化,但是他们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非常大。例如,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的女儿要自由恋爱,他就说,难道孝道都不讲了吗?又如胡适之先生的婚姻就是旧道德的体现。

四、对儒学的批判

对儒学可以进行不同层次的严厉批判,诸如小农经济、家族制、权威性的理念、工具理念、人的自觉发展等等。我打算举两个对儒学进行批判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圣王的观点。儒家的一个基本的信念是内圣外王。就是通过自己内在的修身而后通过经世来治天下。可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从汉代开始,实践的不是圣王而是王圣。也就是指没有通过修身而获得权力的人,他要求的不仅是政治权力,还要求意识形态的权力和道德的权力。所以这使得儒家圣王的思想异化为王圣的实践。我相信班雅明的一个观点,就是最高的理

想、最好的象征符号,比如仁爱和各种很美好的词语,如果落实到复杂的权力关系网络中,它可能出现非常残暴的结果,正如鲁迅所提到的软刀子一样。圣王的观点与泛道德主义或造神运动都有关系。我认为一个彻底政治化的儒家社会要比一个纯粹的法家社会对人的迫害和压迫更厉害。一个纯粹的法家社会基本上是对人的行为作规范。所谓对行为作规范,就是指如果触犯法律,一定治罪,不犯法绝对不治罪。但是一个彻底政治化或权威化的儒家社会,领导者对人民的控制绝对不只是行为,而一定还有态度、信仰等一些下意识层面的东西;就算你的行为非常正确,但他对你还是怀疑的,因为你可能态度不好;也许态度很好,但是你对整个社会的最高理念的信仰可能不坚定;即使前三者都很好,但是你的下意识也可能有问题,做出可能是不健康的梦。所以说彻底儒家化社会是最残忍的,绝对比纯粹的法家社会更加残忍。另外彻底儒家化的政治领导,他所要求的不仅是政治权力,还有意识形态、道德力量。即所谓的造神运动,从而把相对的变成绝对的。

可以说,基督教对儒家的批评是可以接受的。在基督教中,只有上帝是最绝对的;任何人、任何集团、任何事件,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但如果没有基督教超越而外在的上帝,那么传统就可以把相对的变成绝对的。因此我认为五四的批判太不够了、太肤浅了。我们需要在更深刻的理念上进行批判,特别是积淀在民族心灵内部阴暗面层次上的。这些鲁迅所说的国民性该怎样去批评,五四精英改造了这些国民性了吗?事实上,很多东西至少在民国时代更加变本加厉。为什么潜在的恶势力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其原因是我们对它的批判不够,我们只是很粗暴地把整个传统扬弃了。没料到的是,把好的东西丢掉了,儒家的糟粕却深深地进入了我们的心态当中。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三纲的理解。三纲是从汉代开始由法家而进入儒家的。这些在儒家传统中不可消解的观点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从君为臣纲来讲,这确实是专制主义;从父为子纲来讲,这是权威主义;从夫为妇纲来讲,这是男性中心主义。可是现代文明在有着自由、民主、平等的观点下,如何能够接受专制主义、权威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呢?女性主义对儒家的批评非常厉害。从这方面儒家受到批评,受到西方启蒙所带来的精神的冲击,是很容易理解的。更复杂的是关于人权的问题。人权就是人生而有权,儒家突出责任,突出公意。在西方的传统,个人的权利是高于主权的。在很多方面,个人的权利也高于社会和国家的需要,是不可消解的。如果消解任何个人的权利,整个社会的机制就会被破坏。正如伏尔泰所讲过,我对你的意见从头到尾是否定的,而且我也认为你的意见是完全对社会有害的;可是为了维护你发言的权利,我愿意付出我的生命。这些理念在西方是神圣的。也是促使儒学解构的一些更深刻的原因。我认为在一个重大的思想传统中曾经发挥极有影响力的观点,经过时代淘汰以后是可以消解掉的。比如说在基督教的传统中,中世纪的神学家从来没有人质疑通过教会得救这个信念。但马丁·路德提出通过信仰得救的观点,从而使一两千年来的文化观念受到新的文化冲击而被消散。因此,三纲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应当被彻底的消解掉。可是最近王元化提醒我注意陈寅恪先生给王国维的墓志铭中的观点,即认为三纲六纪是中国文化的命脉,甚至像柏拉图的理念论一样是不应该进行批评的。这可能需要进行进一步思考。不过,我认为五伦是没有问题的。父子有亲就是指父慈子孝,君臣有义就是指君仁臣忠,夫妇有别就是分工的观念,朋友有信,长幼有序,这些都是双轨的。

五、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强势的回应及新儒学的发展

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强势的冲击开始作出回应,得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首先是五四以前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五四时代的熊十力和梁漱溟,接下来是在海外、台港地区的一些学者,站在儒家的根源上重新对这些问题作出回应。

新儒学的发展也是经过三代人的努力。第一代从1919年一直到1949年,第二代从1949年到

1979年,1979年以后是第三代。这个工作非常艰巨。如何对西方的强势,不仅是富强,不仅是军事、经济而是更深刻的价值理念作出回应。儒家不经过现代化,就没有办法在现代恢复生命力。如果儒家是封闭地不愿意接受也是不可能的。在整个儒家发展的过程中,孟子就对墨子的批评作出回应;宋明时代也回应佛教;现代也应该回应西方文化。这些都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以前的回应和现代的回应有不同的是,西方文化对中国历史的冲击之大如同将佛教对中国的800年融合以及元代对中国的80年铁蹄统治浓缩成30年的冲击。它不仅是军事、道义,而且是很有说服力的制度,一种更深刻的对人的发展有积极作用的理念,它是很全面的冲击,因而我们必须对西方的传统作出回应。这是否能成功,我认为这才刚刚开始,因为一两百年回应是绝对不够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中国消化印度佛教文明的过程。我们现在说佛教文明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意味着现在用古代汉语所翻译的经典已经超出梵文的经典。所以说,到何时我们才能够说西方的文明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呢?可见对西方进行全面的了解非常艰巨。

新儒家的代表一直在讨论怎样把西方的自由、民主、独立等理念同儒家健康、传统的理念以及政治化的传统结合在一起。在最高层的理念上进行反思的工作非常艰巨。现在的回应本身也有一定的说服力。1982年夏威夷的朱子会议后,台北学者通过《中国论坛》举行了一次对新儒家的反思:到底新儒家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它的情况如何?起初的目的是要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在一个民主化的社会,儒家已经过时了,香港等地如果有民主发展与儒家可能是不相干的;从而从事儒学研究就变成游魂,因为他们所研究的和政治、经济和社会都不相干。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82年新加坡开始设置有关儒家伦理的教材,正在发展东亚哲学研究所(以儒学研究为主);日本的文部省10年的计划是100位日本学者对儒家在日本的发展情况进行评估;韩国的李退溪国际学术会也正如日中天;20世纪80年代我在北大,讨论的两个课题是儒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前景和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是否有相对独立的群体的自我意识,一年后我就深信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20世纪80年代儒学又有了生命力,但是跟从事儒学研究的人没有关系,而主要体现是日本和四小龙在东亚社会的发展。新加坡是个很好的例子,在探讨日本发展的原因时学者们发现,广大的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新加坡人是其最重要的资源。

德瑞克教授对我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儒家基本上被逐出世界舞台。东亚文明的出现,儒家又开始被大家重视;但是商业大潮来临之后,儒家传统基本上被摧毁,这次摧毁和五四以来的摧毁完全不同。他同时认为从事儒学研究的人,因为东亚兴起,可以一时有些说服力,但是过了这个时段,影响将消失。在1997年亚洲的金融风暴,特别是韩国受到冲击以后,大家认为儒家伦理出了很大的问题。以前有观点说,儒家伦理同东亚经济结合,使大家认为经济的发展开始从大西洋转到了太平洋。金融风暴以后,所谓关系资本主义或称为裙带资本主义受到质疑。韩国出现问题之后,西方哲学家、思想家提出,任何一个复杂的现代社会要有好的经济发展和好的管理必须要有公信度和透明度。同时发现,当时韩国受儒家文明的影响是官商勾结,家族制的大财团和政府之间的非常复杂的暧昧关系。关系资本主义是靠同乡、同学的人际关系。这在初步的资本累积阶段有一定的强势,但是它绝对不能同受法治管理与国际金融管理、受现代西方文明所导引的跨国公司相比。这个问题提出以后,西方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思想就为大家所关注。其主流思想就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民社会以及所代表的价值。那么这样看来,基本上儒家传统复活的契机又被破坏了。

一个新的问题是,到底儒家的传统在一个多元现代性、全球化和地方化进行复杂互动的时代,它是否有新的发展契机。这中间很核心的问题就是儒家传统对于民主和科学能否作出创建性的回应。我们了解到,我们并不要求基督教发展出民主科学,也不要求佛教发展民主科学,而基督教和佛教在21世纪都获得了充分的发展。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儒家对科学民主作出回应呢?理由

很简单,因为基督教和佛教真正的核心价值不在这个世界。基督教在未来的天国,佛教在彼岸,所以它们有超越而外在的另外一套理念,有其终极关怀。可是儒家是入世的,是经世致用的,它如果不能面对民主和科学的挑战,要进一步发展就非常的困难。那么这样说来,比如说,如果把民主不当作一个选举文化(熊比特、亨廷顿就把民主当作选举,并认为假如没有选举、政治上没有轮流坐庄,就不是民主),而是把民主当作一种人的素质和生活方式,把民主发展看成一个提高人的基本生活,然后逐渐发展言论自由、建立法治的进程的话,所需要的就是为选举文化创造条件,促进社会多元化,促进权力下放,让市民社会有充分的活力和动力。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一个受到儒家文明影响的社会,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如何运用儒家资源、运用民间知识分子的资源,发展言论自由、建构法治、提高生活,是一个积极的挑战。另外,科学理性事实上和儒家传统也没有很大的矛盾冲突的。那么科学理性所代表的基本价值和儒家传统中所提出的一些基本理念能不能配合,如何配合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最后,儒家如果要进一步发展,绝不可能停留在中国和东亚,作为一个进程它一定要进入国际社会。要进入国际社会必须要经过非常大的转折,可能需要用不同的语言来诠释儒家的经典。我认为用英文来讲儒家伦理非常重要,因为假如不能用英文,那么就表明它不能成为人类文明的不可消除的一部分。如基督教的圣经,不仅用希伯来文,还可用韩文、英文、中文表示;佛教的经典也可以用多种语言表达;那么儒家经典为什么一定要用中文呢,虽然使用英文绝对会导致很多核心价值的消失,但是却有很多新的可能性被开发出来。一批波士顿大学的基督教学者提出了波士顿儒学的观点,认为儒学应该在美国发展。他们提出三个理由:第一,如果能将人当作网络的中心点,比把人当作孤立绝缘的个体更有价值,这种理念对美国的社会应当有好的导引作用;第二,就是儒家传统中的礼对于竞争性特别强而且人情特别淡薄的市场经济应该有较好的作用;第三,宪法保障了西方的抗衡社会得以复杂的互动,其基本精神和儒家的精神能否配套在一起也成为了西方学者的努力方向。这些努力同时也是使儒家传统在受到摧残之后仍具有生命力的机缘。

(本文根据杜维明教授在浙江大学的系列学术演讲整理而成。)

(整理者:汪杰贵,明旭)

[责任编辑 曾建林]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Confucian Traditions

TU Wei-ming

(Harvard Universit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Cambridge, MA, U.S.A.)

Abstract: The discourse first reviews several core values in Confucianism (such as Humanity, Rightness, Ceremony, Wisdom and Trust), and then explicates the complexity and richness of the Confucian traditions on the facets of time, area and level. But under the impingement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ll the traditions of Confucianism are dissipated on the whole. Thus, this lecture points out that, on the one hand, animadversions on Confucianism made by the cultural elites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re still superficial, and the enlightenments of Western values are also skin-deep; on the other hand, Confucianism must respond to the reign of the West, so as to get a lucky chance of renaissance.

Key words: core values; Confucian traditions; cultural impact; Neo-Confucianism